

●石维彩

“情报”改名新论

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term "intelligence" is replaced by the term "information" ends the confused and vague ideas of their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thus both makes clear about the strict assigned meaning of this subject and makes the subject terms have a unified standardization. This change does not mean to deny the intelligence science's achievements of several decades, but to make it head for a new constructive progress with a brand-new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SUBJECT TERMS Intelligence science—Concepts and Ideas
Intelligence—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CLASS NUMBER G350

“情报”改名是关系到文献信息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大事,应该重视。在这里拟对两个问题作出回答:“情报”为什么必须改名?如何正确评价情报科学的历史功过,以便统一思想,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1 关于改名问题

国家科委已于1992年9月作出关于“情报”改名的决定,但还不等于说“情报”改名的问题已经划上了句号。恐怕要统一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毕竟“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存在于我国科技、图书馆及档案馆界已经长达近40年之久。

当前,对待“情报”改名问题,至少存在着三种认识分歧:

第一种,主张全部改名,不再使用“情报”这一术语。主要论点是:“‘情报’……本来就是‘信息’”,因此包括“情报学”在内都应更名^[1]。

第二种,主张部分改名。主要论点是:

“‘情报’改为‘信息’不能一刀切。当它与定语连用时是可以改的,如‘文献信息’……,但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宜改的,例如‘情报学’”^[2]。

第三种,不主张改名。主要论点是:“情报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情报学即将步入21世纪”,“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3]。

很明显,这三种看法是彼此对立的。正如有的同志说,“‘情报’改称‘信息’的探讨已不再是个学术研究或工作研究问题,而成为一个工作实施或工作部署问题。”^[4]

我同意“情报”改称“信息”以及“情报学”亦应更名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改名理由还有待补充。

1.1 需要澄清的几个主要看法

有的同志说:“不知是谁首先误译、混用,结果造成了一个长期在理论上和工作实际中困扰我们的问题”^[5]。我认为,仅从翻译角度看,information译为情报或信息,决不能笼统地说成是误译。翻译上生米煮成熟饭的事

有的是。英国人把“中国”译为 China, 可以说是真正的误译, 因为 China 原义是“瓷器”, 不是一直沿用至今连我们中国人也承认了吗? 其实早在 1948 年郑易里、曹成修两位先生编写《英华大辞典》时就将“information”译为消息、情报了^[6], 以后的英汉辞典都译作信息、情报。

用“词义说”来证明“情报”非改名不可, 也有较大的片面性。当然改名必须考虑词义因素。但是, 我们知道, “情报”与“信息”两词, 无论那一个词也囊括不了“information”全部的含义。

还有一说, 就是认为“台湾图书馆界所用的‘资讯’一词远比‘情报’高明”。实际上, 台湾版的英汉辞典, 有的将其译作情报、信息, 有的译作情报、资讯。如《图书文献咨询辞典》就将该词译作情报、信息, 没取资讯一义。而与其他词结合, 有的译为“资讯××”, 有的译为“情报××”, 如 information prorden 译为“资讯提供者”, information pufication 则译作“情报刊物”^[7]。《文馨最新英汉辞典》对该词则译为“情报、资讯”^[8]。可见台湾学者在这方面也不是很统一的。

1.2 实践是检验“情报”是否需要改名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情报”是否能作为“信息科学”子系统理论体系的一个正确名称, 是否需要改名, 也应由实践来决定。

“情报学家”们将“情报”从“信息”中区分出来, 建立起一门新的学科体系——情报学体系, 目的无非是要使这门学科更适合社会使用。按理说, “情报学”应是“信息学”的下位学科, 而下位学科不一定要贯以上位学科的头衔, 使用“情报”这一名称并无什么不妥。但是, 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 “信息”和“情报”必须有各自质的规定性, 各自的特定范畴和定义。作为两个学科体系的术语, 它们的含义界限必须是分明的, 这样才不致于在使用中引

起混乱, 这是正名的起码要求。

为了给情报、信息正名, “情报学家”们给情报、知识、信息下过许多定义, 而且在有些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如“情报来自知识, 是知识的一部分; 而知识又来自于信息的加工处理”^[9], “情报是人类特定的知识交流”^[10], “信息是情报的母体”^[11], “信息 > 知识 > 情报”, “信息、知识、情报是三个同心圆。外圆是信息、中圆是知识、内圆是情报”等见解几乎成为“情报界”论述情报理论不可逾越的法则。

但是, 信息和情报在实际使用上是否如人们的愿望那样, 真正达到了划清界限的要求呢? 恰恰相反, 这些理论的提出更增添了使用上的混乱和模糊。如果说信息和情报是两个范畴不同的概念, 那么在使用上是不能随便移位和代用的, 如果可以随便移位和代用, 就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两个术语的界限混淆不清, 或者根本就是一个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这两个术语根本不可能构成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难道这还需要使用象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复杂的证据来证明这一推论的成立与否吗? 事实上, 有些提出界定信息和情报的权威情报学者都在使用“信息(情报)”^[12]、“信息也可译作情报”^[13]、“情报经济学(或称信息经济学)”^[14]这样一类表述。再以 intermation economics 为例, 有人译作“情报经济学”, 有人译作“信息经济学”, 如果按已有的定义分类应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若要论述它们的关系, 如按“大小说”来判定, 则“信息经济学”的外延远远大于“情报经济学”, 因为“信息”大于“情报”。但按“同心圆说”来判定, 则“情报经济学”的内涵应比“信息经济”丰富得多, 因为“情报是信息中的信息”。而按“母体说”来判定, 则“信息”和“情报”应是母子关系, 但无法否认的是, 它们都来自同一母体(information), 则又应属同母兄弟关系。要判定“信息经济学”与“情报经济学”谁是谁非, 这个“状”应该告到那里? 就连

我们情报界的泰斗严怡民先生也承认：“在西文中，information 一词和日语‘情报’一词含义相近，既能代表我们所说的信息，也能代表我们所说的情报概念，在他们那里，情报和信息基本上是一个意义，因此，出现了‘信息’就是‘情报’一说”^[15]。既然情报和信息基本上是一个意义，那么，任意使用其中一个意义都应对的。这样，我们所确立的那些界定“信息”和“情报”的理论还能成立吗？非常明显，“情报理论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另找新论，重新确立它们二者的界定；一是将二者统一。从历史经验角度看，应该说后者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3 “情报”一词缺乏严格的规定意义，不符合术语的要求

《辞海》解释，术语是“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每个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这种严格规定的意义，在动植物的科学术语中规定得特别严格。按国际命名法规，动物“严禁不同分类单元使用同一名称”^[16]，“每种植物只能有一个正确名称”^[17]。这就是动植物的科学名称不会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

“情报科学”要作为一门科学确立的话，首先“情报”这一术语必须具有严格规定的意义，但作为术语的“情报”一词却远达不到这一要求。它除了在“图书情报学”范畴内使用外，还在“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的传统“情报”意义的“谍报学”（实际上也是情报学）的范畴内使用。显然，这两种“情报”概念，基本含义是不同的，不少学者曾试图将两者的意义揉合在一起，但都徒劳而无功。当前的报纸、杂志、小说、政论、传记、应用科学到处都在使用传统意义的“情报”一词。《新情报战》、《日谍秘史》、《新谍报学》、《中央情报局》等书所使用的“情报”都是属于“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这一意义的，即使“商业情报战”、“技术情报战”也未背离。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国际大环境中去考察，就会看得更加清楚。而所谓“图书情报”、“情报信息”中的“情报”，则大多

数限于在图书文献系统中使用，其收集的对象多限于图书文献中的信息，其收集的目的是为了“传递或交流”。从“情报机构”来说，两者代表的概念也截然不同。前者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些名副其实的情报机构，而后者所谓的情报机构是指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情报所、信息中心等。无论从活动的性质还是从机构的性质去考察，这两种“情报”概念都是有天壤之别的。

1.4 “情报”改名，必须要讨论和组织手段双管齐下

“情报”作为科学术语，它既与“信息”重叠交叉、混淆，使这两个所谓分立的学科，实际上是“异名同质”，但它又与传统的“情报”词义相分离，而且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体系的“情报科学”，它们却又是“同名异质”。这种怪现象是世界科学史上少见的。我们应该尽快促进非传统意义“情报”的改名，实现文献信息科学术语的规范化，不让这种无法克服术语概念上矛盾的“情报学”进入21世纪，更不应把这种可以纠正的科学上的麻烦事留给子孙后代。

但是，当前人们不仅对改名问题看法不一，而且主张改名的人在使用何种手段达到终极目的上也存在着分歧。有的“不希望引起大讨论”，担心会“因此导致学科的分裂甚至‘消亡’”^[18]，有的则认为“必须进行广泛的学术讨论，绝不能按‘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作出所谓‘改名的决定’”^[19]。

上述两种改名手段的想法，都有较大的片面性。“情报”改名问题，既有学术观点之争，也涉及如何采取强有力组织措施统一规范科学术语的大问题。必须双管齐下，二者不能偏废。

1.4.1 应该进行充分广泛的讨论，统一认识，促进改名。如果认为“情报是宝贵财富，社会科学的基础，各门学科的工具”，还谈得上需要改名吗？到底是“情报”与定语连用时才改，还是“情报学”也要改？到底“情报学”改称

“信息管理”还是改称“文献信息学”，诸如此类问题，不通过讨论单靠行政命令行得通吗？

1.4.2 必须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讨论争鸣都是需要的，但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措施，甚至不能作为主要措施，因为人们的观点和看法要绝对统一是不可能的，应该由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来统一大家的认识，作出符合科学，而又是权威性的决定。世界那么多动植物，在命名问题上都能做到统一，主要原因就是动植物命名是由国际生物科学协会这个权威性机构制订法规规定的。因此，我建议：“情报”改名这件大事，应由全国科协来办。这样，也许可以避免如某些同志所说的那种“长官意志”的现象出现，有利于作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权威性决定。应该说，科协不仅有这个能力，而且有这个义务。

2 关于功过问题

谈到“情报”改名，自然会使人想到如何评价情报科学这几十年的功过问题。公开指责搞错的还不多见，但是借题批评的现象还是有的。例如说改名“是正本清源，廓清学科本来面目，澄清视听，功莫大焉”等一些说法就缺乏科学分析态度。如果要正本清源，恐怕英国人把中国译作 China 真的应该正本清源了。“廓清学科本来面目”也是言过了。无论称“信息学”也好，称“情报学”也好，从申农发表《通讯的数学理论》，维纳发表《控制论》至今也不过40多年的历史，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这门学科介绍到我国时，主要指的还是“科技情报”，在译义上尽管不理想，但从整个理论体系看，除了“情报”这个称谓外，并没有将我国传统的“情报”意义套用过来，而是老瓶装上了新酒，换上了全新的意义，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也正是由于“情报”不是一个死词，“老酒”还香，才导致诸多麻烦。

就目前我们所称的“情报科学”而言，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在科技情报研究方面，还是在社科情报研究方面，都取

得了许多成绩。一大批刊物问世，出版了许多教材和专著，还翻译引进了一批与此有关的论著。特别是在理论探索方面，这十几年来，确实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推动我国图书文献信息理论的深入研究，发展我国文献信息事业是功不可没的。

请那些关心“情报学”前途命运的学者放心，“情报”改名，绝不至于导致学科的分裂，更不会导致学科的消亡，而只会更有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它有利于克服当前“情报学”在术语使用上的混乱理象，特别是在翻译上不会再出现如“信息经济学”及“情报经济学”一类扯不清的皮。有人说“名称只是符号”。我承认“学科本身是科学”，不过不能小看符号。可以肯定，使用符合科学性称谓的术语来命名的学科，一定会以更加矫健的步伐步入21世纪。也许它真的会象人们所预料那样“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各门学科的工具”，在信息社会中大放异彩。

“情报”改名，“情报学家”当然还有一批所谓“情报工作者”怎么办？其实说来也很简单，他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为了统一规范我国科学术语名称，他们的称谓，当然应该相应改动，例如称文献信息学家、文献信息工作者吧。就算是历史错位也罢，复归也罢，超越也罢，总之，他们将以崭新的姿态进入信息的理论殿堂，成为新的文献信息学理论权威。我敢保证，对于那些顺应时代前进的理论伟人，历史将永远留下他们的芳名。

参考文献

- 1 姚健，黄炳坤. “情报学”亦应更名（与邱均平先生商榷）. 图书情报工作，1994，（1）
- 2, 19 邱均平. 关于“情报”改为“信息”的思考. 图书情报工作，1993，（1）
- 3 严怡民. 情报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情报学报，1994，（1）
- 4 霍忠文. “情报”改称“信息”随思录. 情报科学技术，1993，（1）

（下转第73页）

细分到第一个小数点后的第三位,如:F279.243 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I207.309 戏剧文学史。

3.1.2 著者索引。按作者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同音字以笔形横、竖、撇、点、折为序。外文作者姓名以先英文后其它文种字母顺序排列,以首字冠以标识符号的团体作者,均排列在汉字作者姓名前。例:

CMEC 福建公司 93××××
David Canter 93××××
Frederick Harbison 93××××
Gary Yia Lee 93××××
《彭德怀传》传记组 93××××
《中国商人经济学》课题组..... 93××××

3.1.3 题中人名分析索引。其检索途径与作者索引同。

3.1.4 引用报刊一览表,于每年1月和7月号附于《索引》后。各种报刊的排列法是按报刊刊名笔划先后。先报纸,后期刊。除了报刊刊名称外,还反映了报刊的出版地。

3.2 RG的检索途径也有4种。

3.2.1 缩写字和符号对照表(Abbreviations)。主要反映的是出现在RG中的缩写字和某些符号。例如:Por: portrait; introd:

introduction, introductory; Jr: Junior。

3.2.2 引用期刊索引(Periodical Indexd.)。是按期刊的字母顺序排列。除期刊名外,还有价格、出版周期、国际刊号、出版机构、出版地、国别、通讯地址等。例如:Life. \$ 35. m. (Expect semi-m Mr.) (ISSN 0024-3019) Time inc., Time & Life Building,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NY10020-1393。

3.2.3 书评。每一期后均有按原书著者排列的书评。包括:原书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后);书名;出版年;评论文章刊登的杂志名称;卷、页;时间(月份,日期,年代);评论者姓名(名在前,姓在后)。

3.2.4 年度索引(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199X)。RG每年均出一卷年度索引,现已出至第52卷,查阅方便,节约大量时间和空间。

邵金丽 1968年上海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副馆长。已发文章数篇,论著若干种。通讯地址:南京大学,邮编:210008。

(来稿时间:1994-06-06。编发者:黄文田。)

(上接第92页)

- 5 惠世荣. 关于信息与情报范畴的再思考. 图书馆杂志, 1993, (1)
- 6 郑易里. 曹成修. 英华大辞典, 协兴印刷厂, 1950
- 7 洪进德, 李之为. 图书文献资讯辞典. 台湾五洲出版社, 1988
- 8 蔡进松等. 文馨最新英汉辞典. 台湾: 文馨出版社, 1987
- 9, 15 严怡民等. 情报学基础.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 10 谢元泰. 情报概念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情报科学, 1984, (2)
- 11 刘纪兴. 我国情报学研究述评. 情报资料工作, 1990, (5)
- 12 严怡民. 情报学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
- 13 李自新. 情报的经济和价值问题(国外研究概要). 情报学刊, 1993, (3)

- 14 王昌亚, 胡昌平. 试论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 情报学报, 1988, (3)
- 16 朱弘复等译.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 科学出版社, 1988
- 17 赵毓棠, 吉金祥. 拉汉植物学名词辞典.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 18 丁卫. 近年来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情报业务研究, 1993, (2)

石维彩 1937年出生, 1965年广西师大英语系毕业, 1985年起在广西师大图书馆工作, 副研。已在7种期刊上发文8篇, 译著1种。通讯地址: 桂林市育才路3路, 邮编: 541004。

(来稿时间: 1994-04-27。编发者: 黄文田。)